

台灣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將於明年1月11日舉行，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無論最終鹿死誰手，勢必牽動未來的兩岸以至中美關係，敝刊明年2月號的「台灣專輯」將有專文予以分析，敬請讀者留意。

——編者

## 反瞞產與大饑荒的起源

王力堅的〈從「參與式」到「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二十一世紀》2019年10月號）一文，以廣西百色地區自上而下的反瞞產鬥爭為其研究重點。本文讓我們看到，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過程中，1959年2月的反瞞產運動起到了極大的助推作用。如果以歷史的積極能動者的角度來檢視，則這一過程的積極推手是省級領導人，如廣東趙紫陽、廣西劉建勳，以及地委一級領導人。事實上，毛澤東之所以把已經在各地初現苗頭的針對農民的反瞞產變成一場全國性運動，正是源於趙紫陽的一份報告。雖然毛澤東也派出自己的秘書進行調查，但這一過程揭示了省委一級幹部的報告對其決策的影響仍相當之大。

當然，毛澤東是一個複雜的人。因趙紫陽報告而由毛發起的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卻在一個月後悄然收場，原因是毛發表了一系列同情農民和理解瞞產的言論。筆者認為「毛澤東」始終具有多重形象——認為瞞產情有可原的是那個反抗權威、同情小人物的革命者毛澤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東，但作為兩次反瞞產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畢竟是體制的建立者和維護者，以及權威不容挑戰的領袖。而第二次運動的背景又恰好是彭德懷的倒台和隨後的反右傾運動，在反右傾的背景下，再激烈的基層反瞞產行為都可以得到寬容了。另外，在毛澤東對農民的同情之外，還有以鬥爭來「教育農民」的一層考量。

由於產量虛報，所謂「瞞產」本身就是今天所說的「偽命題」，其實質是農民留下了自己應得的部分，而反瞞產事實等同於國家赤裸裸地從農民手上搶奪口糧。王力堅以扎實的數據表明，正是在兩次反瞞產運動之後，百色地區出現了明顯的人口非自然死亡。然而，筆者以為，「參與式動員」和「命令式動員」這種美國學者創造的概念框架是不盡適用的。反瞞產運動與其說是動員原本消極的農民，不如說是國家積極對付同樣積極抵制的農民。國家的對付手段在第一階段以宣傳說服為主，而在第二階段因為反右傾的大氛圍而變得激烈和暴力，以壓服為主，其動機在本質上並沒有很大的區別。既然農民一開始就想好了要藏匿屬於自己的口糧，官

方報刊上宣傳的積極「交心」和「報糧」，也可想而知不可能是發自內心的。作者似乎忽略了已故的高王凌教授的相關研究，以及他針對瞞產和藏匿提出的重要闡釋概念：「中國農民的反行為」。

伍國 美國

2019.10.12

## 如何做好黨員？

安劭凡的〈「做好黨員」：1950年京郊黨員訓練班的日常政治〉（《二十一世紀》2019年10月號）是一篇視角具體、材料豐富、行文充滿細節性描述，並有歷史洞見的論文。這篇文章雖然僅僅描寫了北京郊區為期兩周的黨員訓練班，卻以小見大，討論了中國政治的許多經典議題：中國是否如想像中的西方社會那樣存在相對清晰的國家—社會邊界？國家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塑造了人的思維意識？中國的「強國家」在基層社會的能力邊界和局限性在哪裏？相對非組織化的民眾和個人，又有哪些思想資源和行動策略以保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

通過爬梳地方檔案館的資料，作者就上述問題提供了一些具有理論啟示的答案：受制於受眾的教育程度、時間精力以及幹部的宣講水平、任務角色衝突等各種因素，國家未必能夠完全灌輸某個具體的政治觀點，特別是知識上較為複雜的經濟和國際問題；但一些簡化事物複雜性的認知框架，比如構造二元對立，卻能夠通過高強度的反覆宣講以及相應的動員參與，深刻塑造人的思維，進而使之不自覺地運用到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當這種運用變得持久而廣泛時，就能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作者還指出，民眾與不合心意的國家干預之間也不是簡單的反抗關係，一方面是因為大多數人從思維上不具備反思的思想文教資源，另一方面也是基於理性計算：面對無可改變的既定政策，農民選擇積極順從，然後逐漸尋找機會，利用這些政策來實現自己的議程。

這篇文章如果作為研究起點，仍有很大繼續探索的空間。途徑之一是對京郊個案的歷史情境進行拓展和比較分析。眾所周知，「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中國革命和建政的獨特武器（雖然蘇東國家也有類似實踐，但強度和重要性大為不及），有着漫長的歷史和廣泛的運用。在不同時期和地域，它的實施主體、方法、對象和實際影響力有着相當大的不同。作者選取的1950年是極具社會學意義的年份：中共剛剛贏得內戰取得政權，一方面在民眾中享有很高的合法性，在力量上相對於殘存的反革命勢力佔有壓倒性優勢，另一方面則因為快速佔領城市而面臨

着政工幹部不足的問題。這與抗日戰爭的根據地時期、極度重視「精神」的1960年代、文革後國有企業工廠興起的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後「思想政治工作」被經濟技術替代的局面，有着諸多方面的不同。若與這些情景作比較，可望繼續深化本文理論議題的探索。

周陸洋 美國

2019.10.12

### 建構敵人與現實

在知識系統中，以西方而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元論的產生。二元論雖然在其後遭到批判，但卻在某種程度上持續地在西方思考和知識模式中發展。我們可以說它是為了理解世界而建構的思想系統。這些思想系統大都把複雜的現實進行簡單化的處理，從而造成了某種「妄想」，即只要掌握了世界和歷史運行的規律，便能夠創造一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們會對自己進行自然化，即讓我們覺得某一思想系統就是某種普遍真理而不容置疑，從而掩蓋了其建構的本質。

在王海光的論文〈四清運動的階級鬥爭建構——「桃園經驗」研究〉（《二十一世紀》2019年10月號）中，作者通過對四清運動中具綱領性地位的「桃園經驗」進行文獻和實地考察分析，發現「桃園經驗」本身就是一個由劉少奇和王光美等人所建構的「現實」和「經驗」，而建構的目的是為了使其能夠符合且用於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發展的改造。

這裏就存在着一個十分弔詭的現象，即原本我們以為是

四清運動「原因」的東西，最後卻發現是「結果」，只不過通過回溯性的述行（performativity）手段建構出來。這一手段就如文章中所指出的，在近代共產黨的政治運作和意識形態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來源或許與「被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有關，近代共產黨對於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一觀念的發展，最終導致對於現實、社會和思想的徹底重塑。因此在其中，真假、是否事實都已經不再重要，述行手段帶着目的論和功利主義的傾向，成為創造這一「新現實」的權力者的工具，從而達到改天換地的目的。

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強調「對立面」的重要性，或許同樣是對於馬克思階級鬥爭這一暗含着西方傳統二元論觀點的僵化發展，即「敵我」的劃分成為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核心（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能看到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子），從而導致複雜的社會、現實和問題被簡單地理解為兩個不同階級或是各種面向間的殊死鬥爭。二元對立的鬥爭論最終必然導致某種本質論的產生，從而徹底建構出新的社會等級以及公民區隔。就如作者所指出的，在「四清運動中的階級鬥爭概念化和虛擬化，強化了階級出身的政治標籤化，發展出一條從強化階級成份開始，『唯成份論』隨之泛濫，再到文革『血統論』猖獗一時的歷史演進線路」。

宋杰 上海

2019.10.15